

# 道德判断测验在中国的研究综述

□张 静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006]

**[摘 要]** 道德判断测验(MJT)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德开发的适合于研究儿童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国际性测量指标。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一些学者在道德判断能力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尽管其中很多研究不是运用 MJT,但这些研究结果反映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基本道德判断能力。运用 MJT 在中国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研究角度多样、研究方法丰富,但研究的系统性不够,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有待加强。

**[关键词]** 道德判断能力;道德判断测验;道德认知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1)06-0091-05

## 一、问题的提出

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简称 MJT)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乔治·林德(Georg Lind)在继承和发展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上,开发和研制的一种适合于小学以上儿童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方法。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被翻译成近 30 种语言,被试多达十几万,是跨越欧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 40 多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一直坚持从事道德判断测验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儿童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回首国际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发展的研究,反观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理性地分析中国道德判断测验的研究和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思想启示,运用道德判断测验的研究来促进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和促进中国道德心理学研究者与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二、中国道德判断研究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有 5000 多年人类文明史的东方大

国,其道德教育心理学思想的历史悠久。尤其是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经历百家争鸣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高扬“百家争鸣”的时代旗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思想论争。直到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确立。至此,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和规训便成为中国道德教育心理学思想的一种文化传统。时至今日,古代道德教育的某些观念仍然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进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纵观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研究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道德教育有悠久的教化传统,但缺乏运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道德心理的科学精神。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学术界对于道德认知的研究才从最初的介绍和评述国外的理论和研究,转向开始有了中国本土化的探索研究。在道德心理结构的各成分之中,中国当代道德教育心理学家在道德认知方面的研究要比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丰富和深入,尤其是在道德判断和推理的实证研究方面,获得了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

截止 2011 年 11 月,笔者以“道德判断能力”

**[收稿日期]** 2011-10-10

**[基金项目]** 第47批中国博士后基金(20100471157);2010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0YJC710078);2010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396-GK100047)。

**[作者简介]** 张静(1978-)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副教授;杨韶刚(1955-)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战略研究决策》主编,博士生导师。

为题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电子期刊网上搜索到36篇文章和7篇硕士论文。其中,1980至1999年的有7篇,其余的则是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将主题搜索范围扩大至“道德判断”,只有183篇。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成果,其中这两年的就有20篇。可见,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

### (一) 早期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以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理论为背景,以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为研究手段,考察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水平和责任心等一系列道德认知变量。最早的研究是1982年李伯黍等人在全国18个地区,对2000多名5~11岁儿童开展了一项“我国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的调查。1986年湖南的一批心理学家组成品德心理研究协作小组,研究了少年儿童道德行为评价能力。1992年陈会昌对“我国中小学生的责任观念、劳动观念以及爱国观念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我国儿童道德发展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比如,1991年,顾海根、岑国桢、李伯黍等人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儿童所做的比较研究。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以科尔伯格理论为背景的相关理论的实证研究。如1998年寇忒根据吉伯斯(Gibbs)开发的社会道德反应测验(Sociomoral Reflection Measure-Short Form)和怀特的道德权威量表(Moral Authority Scale——MAS)对“我国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我国心理学工作者除了研究儿童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的现状,还对道德认知发展的相关因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1982年岑国桢、李伯黍就对“儿童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欣银等人以莱斯特等人开发的确定问题测验(DIT)为测量工具,对我国青少年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陈欣银将英文DIT的量表译成中文,并对其信度和效度的指标进行了验证。他的《道德判断的“确定问题测验”及其应用》<sup>[1]</sup>是在电子期刊网上出现的以“道德判断能力”为题名的第一篇文章。首次详细地介绍了“DIT”的理论基础、构建及应用研究。使中国读者对“道德判断能力”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为以后的研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90年高玄珠等人在《父母必读》这样一本普通育儿读物上发表了关于“道德判断能力”实证研究的文章,题为《正确对待儿童道德品质发展的潜力——关于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调查》<sup>[2]</sup>。研究对象为3~9岁的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研究方法采用简单的观察法和实验法。1993年刘锋等人在《道德与文明》杂志发

表《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好方法——道德两难故事课堂讨论》<sup>[3]</sup>,提出了将理论具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的建议。而首次结合国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则始于上海师范大学的李伯黍、顾海根等人围绕“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及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课题展开的,其成果为1994年发表在《上海教育科研》上的《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编制中的几个问题》<sup>[4]</sup>和1997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的编制及常模制定》<sup>[5]</sup>。这无疑将中国在“道德判断能力”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他几篇文章也多是围绕中小學生展开的基本理论研究。

此外,1999年郭本禹在其专著《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科尔伯格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对科尔伯格理论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阐述、恰如其分的评论;介绍了确定问题测验的相关内容;分析了早期确定问题测验的理论来源、记分方法等。这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确定问题测验的全景式框架,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 近期研究

21世纪的这11年中,我国学者围绕西方的道德判断、道德认知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评述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例如,杨韶刚围绕“确定问题测验(DIT1和DIT2)”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2004年他发表《什么是有道德的人?——当代心理学向科尔伯格提出的挑战》<sup>[7]</sup>。该文从理论高度分析科尔伯格理论“只有冷冰冰的道德骨架,缺乏鲜活的道德血肉”的现实,并主要介绍了北美道德心理学在科尔伯格去世之后的一些研究动态,这无疑为我国研究者进行实证探新指引了方向,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杨韶刚等人还引介了明尼苏达大学道德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如《确定问题测验与道德心理的结构成分探析》<sup>[8]</sup>。2006年杨韶刚在《确定问题测验与新科尔伯格理论》一文中对确定问题测验与科尔伯格理论的相异之处进行了比较,指出确定问题测验的理论基础已经突破了科尔伯格理论旧有的某些不合理之处,由此形成了新科尔伯格理论<sup>[9]</sup>。

德国康斯坦斯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德(Georg. Lind)的道德判断测验也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2002年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赵占强与林德教授联系,最早尝试在中国进行道德判断测验,2003年他以《志愿服务活动与高中学生品德发展的相关研究》为题完成了其硕士论文,通过

对很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学生和不经常参加的学生进行的比较,发现他们在道德判断能力上差异不显著。但林德教授对赵占强的这项研究的效度不甚满意,这个研究也不是主要使用道德判断测验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

2001年杨韶刚在加拿大参加第27届国际道德教育学会的年会期间结识了林德教授,2003年取得林德教授授权,同意其在中国使用MJT开展研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生吴慧红在江苏省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系统的“道德判断测验”的实证研究。其中被试的年龄从12岁到22岁,共724名被试,涵盖初中、高中、大学,7所学校10个年级。该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此次调查的被试在MJT上的得分较低(中学平均得分为26.9010,高校平均得分为28.8699),但符合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规律性。即各年级学生在MJT中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总体趋势是年级越高C分数得分越高。可见教育在学生道德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调查也发现:积极参加社会和团体活动有利于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而男女生、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专科生和本科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推断出智力 and 性别这些因素并不直接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sup>[10]</sup>。

2007年王云强、郭本禹等人运用MJT,以300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年级差异显著,年级越高,道德判断能力的C分数越高,这个结果符合林德教授的研究预期。2)道德判断任务的自我相关性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不显著。3)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即快乐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高于悲伤状态。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sup>[11]</sup>。

2008年郑晓宁运用MJT对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进行了道德判断能力的测验,结果显示罪犯MJT平均得分为17.91。大多数罪犯的道德判断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也就是较低水平。城市罪犯道德判断分数显著高于农村罪犯( $t=-2.155, p=0.032<0.05$ )。新旧罪犯的道德判断分数有显著差异,新罪犯的道德水平得分高于在监狱待过很长时间的罪犯。在实验统计中把罪犯犯罪类型分为了盗窃、暴力、性、毒品和职务及其他六种类型。其中除了暴力和职务类犯罪之间分数有显著差异( $P=0.025<0.05$ )外,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其他群体道德判断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F=1.343, P=0.245>0.05$ )。虽然这项研究在取样和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也没有发表,但基本反映

了犯罪群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009年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张宝菁在其毕业论文《高校德育现状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中运用MJT对38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后通过数据分析探讨了高校道德教育各因素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2010年香港城市大学黄成荣和澳门大学郑汉光对澳门青少年在不同年龄水平下的心智发展及道德判断能力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个人品德操守方面,10岁以下的儿童进入青春期时有显著下降的情况,当到达14岁左右,急速下降情况停滞,而且趋于平稳。而在道德判断能力方面则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显著上升的趋势,直至14岁左右;在14岁以后,他们的此项能力一般处于较高水平。可见,14岁似乎是澳门青少年心智发展的分水岭,澳门政府可考虑以此为刑事责任年龄改革的依据<sup>[12]</sup>。

2011年彭莉、陈芳等人以湘潭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聋生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聋生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要显著落后于同龄健听学生的水平,且存在发展环境单一和发展支撑缺乏等问题,这些主要受到聋生主体因素、家庭环境、教育设置和课堂教学等的综合影响。这一结果对于引起社会、学校和家庭各界注意提高聋生的道德教育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sup>[13]</sup>。

### 三、中国道德判断能力研究的理性思考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正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在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道德现象。近年来,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逐渐扩大,研究的角度和采取的方法也更多了,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 (一) 研究对象扩大

道德判断测验不仅被应用到幼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群体,还用来研究情绪和行为障碍群体、犯罪群体、行政、竞争情报等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不同,但这些群体均已有所涉及。2004年吕建华的《幼儿具有道德判断能力吗》<sup>[14]</sup>是继1998年郁全胜的《培养幼儿的道德判断能力》<sup>[15]</sup>的第二篇以幼儿为对象研究道德判断能力的文章。针对中小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研究较多,从2001年倪伟的《中学生宽恕风格的发展及其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相关研究》<sup>[16]</sup>到2008年熊文芬的《德育别忽视了对中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sup>[17]</sup>及2010年王清华的《浅谈初中思品课引领初中生道德判断能力发展》<sup>[18]</sup>。虽然大多数是进行的理论综述,

但也表明中国学术界对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关注。大学生群体也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从2002年王晓虹的《提高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之我见》<sup>[19]</sup>到2007年杨杰的《角色分解: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及前面提到的2009年张宝菁的硕士论文《高校德育现状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景俊的硕士论文《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2008年张志君等人的《聋哑与听力正常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比较研究》<sup>[20]</sup>,2011年彭莉的《聋生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将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障碍人群。2009年黄文新的《领导者的伦理标准与道德判断》<sup>[21]</sup>、龙国智的《行政谎言的道德判断模式》<sup>[22]</sup>及2010年李传军的《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选择》<sup>[23]</sup>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了行政领域。2010年吴磊明的《道德判断及其在竞争情报行为中的应用》<sup>[24]</sup>则将研究范围运用到了竞争情报领域。

## (二) 研究角度增多

道德判断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与很多影响因素有关,近年来,中国学者探索与道德判断能力相关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如王芳、顾海根于2008年发表的《青少年自我价值感及道德判断能力与价值观的关系研究》、王云强等人的《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肖前国等人于2009年发表的《不同情绪唤醒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sup>[25]</sup>、江西师范大学肖三容的硕士论文《中学生人格特质、家庭环境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付慧欣的硕士论文《初中生道德判断能力、同情心对其助人倾向的影响研究》等。还有些文章针对道德心理学理论在现实中遇到的困境进行了理论思考,如张奎明于2001年发表的《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研究述评》<sup>[26]</sup>、张冬玲于2007年发表的《对培养受教育者“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质疑》<sup>[27]</sup>、刘天娥的《在真实道德冲突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sup>[28]</sup>。将道德判断理论运用到实践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增多。如首都师范大学樊宏宇的硕士论文《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蔡磊的《讨论法在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中的实践运用》<sup>[29]</sup>、张绪姝的《巧用“道德两难法”促进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sup>[30]</sup>、沈晓敏的《在对话和协商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sup>[31]</sup>、2010年黄成荣等人的《从青少年心智发展及道德判断能力看澳门刑事责任年龄改革》,等。此外,2010年元奎言发表的《神经伦理学视角下的情感与道德判断》<sup>[32]</sup>从神经伦理学的角度展开了对道德判断的研究。

虽然这些研究大多不是运用林德教授的MJT进行的研究,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关注。

## (三) 研究方法丰富

我国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界对皮亚杰、科尔伯格以及道德认知学派方法论的大量介绍为学者们在实证研究方面起了示范导向的作用。因此近20年来,我国学者对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多运用认知评价的方法。而在具体方法上,较多采取间接故事法、问卷法、量表法、访谈法等非实验方法。也有些研究运用了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法。庄康义2003年的文章《道德判断评估的方法》<sup>[33]</sup>详细介绍了国外道德判断能力的几种研究方法。近几年来开展得较好的主要是杨韶刚及其研究生和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的郭本禹等学者。他们曾使用中文版的MJT和DIT-2在南京、苏州等地对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测试。如吴慧红的硕士论文《道德研究新视角:道德判断测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孙秀娟的硕士论文《确定问题测验II的心理学研究》就是分别围绕这两种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

近30年来,我国学者对道德判断、道德认知领域的研究虽取得一定的进展。很明显,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同时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从研究的方法、研究的主题等方面来看,目前我们对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过于分散,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没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系列研究和构建有关的理论框架,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工具。道德判断能力的理论研究方面则大多停留在表层,有深度、有思想、有价值、有国际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更欠缺一个完整的实证研究的科学支持体系。因此,要想让我们的道德心理学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校道德教育,促进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我们确实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1]陈欣银.道德判断的“确定问题测验”及其应用[J].心理科学,1988,(03):19-24.
- [2]高玄珠,聂淑君,等.正确对待儿童道德品质发展的潜力[J].父母必读,1990,(07):7-8.
- [3]刘锋,刘力平,等.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好方法——道德两难故事课堂讨论[J].道德与文明,1993,(06):24-25.
- [4]李伯黍.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编制中的几个问题[J].上海教育科研,1994,(05):1-4.
- [5]顾海根,李伯黍,等.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的编制及常模制定[J].心理科学,1997,(03):197-285.

- [6]孙秀娟.确定问题测验II的心理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 [7]杨韶刚.什么是有道德的人?——当代心理学向科尔伯格提出的挑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23(04):48-51.
- [8]杨韶刚,吴慧红.确定问题测验与道德心理的结构成分探析[J].教育科学,2004,20(06):56-59.
- [9]杨韶刚.确定问题测验与新科尔伯格理论[J].思想理论教育,2006,(04):26-30.
- [10]杨韶刚,吴慧红.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6,26(02):55-60.
- [11]王云强,郭本禹,等.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J].心理科学,2007,30(6):1324-1327.
- [12]黄成荣,郑汉光,等.从青少年心智发展及道德判断能力看澳门刑事责任年龄改革[J].青年探索,2010,15(04):24-32.
- [13]彭莉,陈芳,等.聋生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2011,3(01):31-33.
- [14]吕建华.幼儿具有道德判断能力吗[J].家庭教育,2005,(Z1):92-96.
- [15]郁全胜.培养幼儿的道德判断能力[J].家庭教育,1998,(12):22-25.
- [16]倪伟.中学生宽恕风格的发展及其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相关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2001,(02):98-104.
- [17]熊文芬.德育别忽视了对中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2008,(37):91-94.
- [18]王清华.浅谈初中思品课引领初中生道德判断能力发展[J].新课程研究,2010,(11):180-181.
- [19]王晓虹.提高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之我见[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02):34-35.
- [20]张志君,陈斌斌,等.聋哑与听力正常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比较研究[J].心理研究,2008,1(5):32-35.
- [21]黄文新.领导者的伦理标准与道德判断[J].社会纵横,2009,24(06):14-17.
- [22]龙国智.行政谎言的道德判断模式[J].学术论坛,2009,223(08):40-46.
- [23]李传军.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选择[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22(04):21-24.
- [24]吴磊明.道德判断及其在竞争情报行为中的应用[J].图书与情报,2010,(02):31-34.
- [25]肖前国.不同情绪唤醒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J].中国德育,2009,(04):31-33.
- [26]张奎明.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研究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01,(06):31-36.
- [27]张冬玲.对培养受教育者“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质疑[J].当代教育论坛,2007,(03):92-93.
- [28]刘天娥.在真实道德冲突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4):58-60.
- [29]蔡磊.讨论法在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中的实践运用[J].卫生职业教育,2005,23(14):152-154.
- [30]张绪妹.巧用“道德两难法”促进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J].班主任,2005,(1):32-34.
- [31]沈晓敏.在对话和协商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J].全球教育展望,2006,228(08):42-46.
- [32]仝奎言.神经伦理学视角下的情感与道德判断[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30(02):42-47.
- [33]庄康义.道德判断评估的方法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3,(09):23-37.

## An Overview of Moral Judgment Test in China

ZHANG J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YANG Shao-g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Moral judgment test is an internationally appreciat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dicator developed by German psychologist, Professor Georg Lind, which could be used to test the moral judgment competenc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recent 30 year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chieved some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of moral judgment abilities. Although many of them are not the research that uses MJT, the findings reflect the fundamental abilities of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that uses MJT also finds some results with much enlightenment. The researches increases, its methods become richer, and its research scope expands, but the systematic researches are lack and the researches with deep thoughts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moral judgment competency; Moral Judgment Test; development of moral cognition

编辑 刘波